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滇缅铁路修筑过程中的抗疟与抗战

付春

滇缅铁路，一条发轫于清光绪年间、兴建于抗战烽火中的战略交通线——虽因日军占领缅甸最终被迫炸毁，未能如滇缅公路般成为“抗战生命线”，却凝聚着数万铁路专家与30余万劳工的牺牲精神。他们在滇西崇山峻岭间流血流汗，积极投身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更值得铭记的是，国际援华卫生团体与中国军民在此共抗疟疾，用现代医学与协作精神筑起“生命防线”，不仅保障了筑路工程推进，更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抗战，在中国大地上书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光辉篇章。

滇缅铁路修筑过程中面临的“瘴气”威胁

滇缅铁路全长860公里左右，穿过萨尔温江和湄公河的山谷。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山谷一直被认为是疟疾的死亡陷阱。早在论证滇缅铁路路线选择时，李日垓对当时试图走南线要经过云云等高疟区可能会造成人员大量伤亡进行了讨论，由此建议走北线避免烟瘴之害。而亲自参与滇缅铁路西段南线的勘测和施工人员也感受到了瘴疟的肆虐，当时，“曾从昆明招工2000余人到西段，因患瘴病死亡者约三分之一，逃亡者约占三分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修筑滇缅公路时，工人“有百分之三十患有疟疾”。为了打通滇缅铁路，国际卫生组织及中国卫生团体纷纷前往滇缅铁路沿线进行疟疾的研究与防治，以保证筑路工人的生命安全和滇缅铁路的顺利完成。

国际卫生团体在滇缅铁路沿线的抗疟与宣传

为协助滇缅铁路的修建，国际卫生组织派遣以美国人哈斯为首的卫生专家协助中国抗疟。美国抗疟团的到来，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例如，花新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迎美国抗疟团》的演讲词。他首先阐明了中国抗战的正义性，由此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支持；其后，就美国在抗战中积极支援中国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对抗疟团来华抗疟的国际意义进行说明，认为抗疟团的工作是对我们英勇抗战的肯定。他们亲眼看到“滇缅路恶瘴之区，青年运输同志舍命抢运物资，许多没有医药设备的地方，我们的同志在病与死的挣扎中争斗”，这些“相信必定可以增强反侵略的力量”；再次，对于抗疟团的作用进行阐

释，认为他们是“定可以减少数千万生命的死亡，定能减轻滇缅公路一线上工作人员的痛苦，定可以加强我国公共卫生的建设”。最后，对美国抗疟团到来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展望，“我们相信，哈斯一行同志之来，定能满足我们的希望，最低限度，在技术上是能给予我们帮助，至少在滇缅一线工作同志是能恢复往昔之健康”。

丁承元在《从征美国抗疟团日记》里则介绍了抗疟团的工作详情：首先介绍了滇缅公路修筑的历史及艰辛，它的修筑使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人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描述了抗疟团工作地点瘴气流行的情况，认为疟蚊是造就瘴疫的直接原因，“死于瘴气，不如说是死于蚊子，孤魂冤鬼，荒凉废墟，都是蚊子所造成的。”接着记述了抗疟团的产生及工作概况，“铁路期于必成而且需速成，于是集中了全国80%的土木铁路人才，动员了几十多万民工，那么蔚为大观征服自然的一支大队伍，却又不得不经过一些视为畏途的瘴区……我国的友邦政府派来了十几位抗疟专家……组成一个抗疟团……负起消灭蚊子消灭瘴气及其他疾病的任务，保障数十万员工及边区同胞生命的安全”；最后，则对美国朋友帮助给予感谢，“我们打了五年仗，朋友越来越多，凡正义人士都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

除了哈斯抗疟团之外，国际卫生组织还派遣法国人罗伯逊到滇缅公路沿线进行调查研究，旨在“对滇缅公路上疟疾防控的建议进行系统化，以便在不久的将来提出一个统一的方案”，为滇缅铁路的疟疾防控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中国学者在滇缅铁路沿线的疟疾调查与防治

国内许多著名热带传染病专家也

从四方云集于滇缅铁路修筑沿线，进行疟疾调查研究与防治，积极配合“抗疟团”的工作。吴文华作为一名医师参与了滇缅铁路修筑过程中疟疾防治与调查工作，在孟定医院工作过程中结合实地调查与临床诊治写就了《滇省孟定瘴气之概况》一文，交代了其到云南的原因：“云南西部在抗战以前，是全国最闭塞的边区之一，瘴病与交通的不便，将这滇西封锁在落后的圈子里……抗战以后，我们政府为了要适应环境的要求和建设大后方起见，居然能于短短的一年中，筑成了伟大的滇缅公路……更计划筑滇缅铁路”。吴文华在滇缅交界的边境工作了一年多后讲道：“一切神话似的传说就打破了，不少，有名的瘴病区域如云州、孟定，并不如何使人害怕……滇西是烟瘴之区，十年前还是使人裹足不前，但当把滇缅间的崇山峻岭凿开交通后，顿使这些靠近滇边的城市日趋繁荣了。”吴文华试图对边疆庞杂的瘴气病名称、发病症状与现代意义上的疾病名称一一对应，并对恶性疟疾主要临床症状进行归纳、对不同症状恶性疟疾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等，这是以滇缅铁路修筑为契机，对云南疟疾调查与治疗的一份代表性之作。应元岳医师到云南后，作为云南疟疾防治研究所的主要成员，在滇缅铁路修筑时被铁路督办公署特聘为医务顾问，赴滇西一带调查。这些专家和学者在滇西深入群众，进行卫生、防疫知识宣传，发放药品，让当地群众了解疟疾以及学会预防疟疾，例如，“人人施用蚊帐、设备免蚊棚舍、消灭疟蚊幼虫、隔离现患疟疾者、对于曾患疟疾者给适量奎宁，以资防治，根治患者，住宅在高爽之区”等。这些积极的防治工作，让当地人民体验到了科技的作用，可以说滇缅铁路修筑对沿线各区域卫生方

面的意义不言而喻。

以上为在滇缅铁路修筑过程中国联卫生组织及中国军民共同抗疟的一个侧面，由于是在抗战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这次防疫工作……（中国政府）处处表示着同盟国的合作”，为滇缅铁路的修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周钦贤言：“滇缅铁路之修筑，有许多工人因缺乏防备，故患疟者甚多，有的甚至死亡……直到后来几个研究疟疾的人到那边后，向他们解释疟疾的病因是完全由于蚊子传染……并义务替他们验血看病，免费治疗……慢慢的，不单外边去的人，久居当地的土著都明白那可怕的‘瘴气’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了”。这些情况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滇缅铁路修建时的疟疾调查与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滇缅铁路修筑过程中，国际社会援华卫生团体与中国军民共抗疟魔的行动，运用现代医学的疟疾治疗与防御手段，有效缓解了疟疾对滇缅铁路修筑人员生命的威胁，从治疗与舆论两方面支援了中国抗战。这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与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次有益合作。

【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副教授；本文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2025年重大课题“云南边疆治理的历史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25YNDXXJ51）的阶段性成果】

高玉柱：不远万里谋认同

何守伦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永胜县灵源村涌现出被誉为“滇西才女、民国新流”的高玉柱。她曾担任国民政府“边疆宣慰团”少将团长，其生平事迹被

收录于1989年版《永胜县志》及1991年版《云南通志》。高玉柱不仅在抗战中功勋卓著，更在推动西南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家学渊源：滇西才女的成长之路

高玉柱，字肇辛，号北胜女史，生于1906年，为世袭北胜土知州高长钦之女，其先世系白族先民樊人。高氏土司家族在永胜统治八百余年。随着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永胜高氏土司渐趋衰落，高长钦即为末任土司，作为当地最具影响力的土司后裔，高玉柱虽生于家道中落之时，仍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生活优渥。

高玉柱自幼在永北镇灵源村高氏土司所设私塾就读，受业于名师杨精品等人，学识广博，名扬滇西。杨精品常勉励她：“女子亦当男儿志，志在四方，身为国用，勿以红楼绿窗，等闲虚度，空过年华。”高玉柱毕业于大理女子师范，后又在云南大学修业，展现出新时代知识女性的特质。

三赴南京：自觉表达政治诉求

使高玉柱声名远扬的，是1936年6月至1937年7月期间，她作为西南民族地区土司代表，与纳西族民众代表喻杰才一同，受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推举，三次赴南京向国民政府提交请愿书，呼吁国家承认西南少数民族地位并赋予相应政治权利。高玉柱在首次请愿中即提出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在中央与地方特设相关事务机关等诉求。其间，她与喻杰才多次前往上海，参观工厂、学校、报馆与图书馆，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并应邀频繁演讲，向公众报告西南少数民族工作的一般情形，希望注意边疆事业者，加以协助发展。

请愿之所以持续三次并计划第四次，主因在于所提意见多数未获国民政府采纳。她频繁赴沪活动，初始或无意造势，却在客观上推动了舆论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民政府作出有利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决议与表态。

首先，这深刻反映了以高玉柱、喻杰才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与国家的强烈认同，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在高玉柱的文章中，她系统阐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西南少数民族分布于滇、黔、川、康、粤、桂各地，成为当地之土民。西南少数民族，实在是中华民族，和汉族关系极深。这些认识充分彰显了她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

其次，高玉柱的请愿与宣传活动有效增进了国人对西南少数民族、边疆危机及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知与关注。她通过演讲、呈文及报端多次阐述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介绍其所受压迫与外来侵略，并系统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深刻认同。在《中央政府各部会长官呈文》中她又强调，伏念数千年来，我西南少数民族，勤宣王事，备载史册，尤以团结一致，固保边疆为唯一之信念。

这些观点通过《申报》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刊广泛传播，使高玉柱等人的南京、上海之行成为推动民族认同与边疆关注的重要契机。其请愿目的是“为求全国明了西南边疆数千万少数民族生活状况，并谋改善文化建设……引起注意强敌觊觎西南边疆阴谋”，并呼吁“欢迎内地同胞前往开发”，以防“外人乘机覬覦，再造成东北之覆辙”。

上海各界对高玉柱予以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她受邀参与各类活动二十余次，《申报》对其行程进行了持续报道，当时媒体称她“差不多已经成为举国皆知和举国瞩目的第一位闻人”。由她发起筹组的“西南边疆开发协会”，亦得到上海地方领袖“群加赞助”。这些反响既体现了上海各界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同与支持，也有力增进了国人对西南民族、边疆危机及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关注。

抗战宣慰：从民族认同到赤诚报国

高玉柱南京、上海之行的意义在全面抗战时期进一步显现。1938年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高玉柱与喻杰才亦随之转往。1942年，随着日军占领越南、缅甸并进犯滇西，战局日趋紧张，国民政府对云南边疆形势深感忧虑。为此，当局组织“边疆宣慰团”，旨在“增强边疆土司内向之心，激发爱国热忱”，任命高玉柱为少将团长，丽江喻杰才为上校副团长，负责对云南等省民族地区的土司、头人与民众开展宣传慰问工作。

高玉柱返滇时，省主席龙云派六十军军长安恩溥亲赴蒙自迎接，并护送至昆明五华山。在昆明期间，她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广泛访问官绅与土司头人，还不时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积极开展抗战宣传。其间，她在安宁创作了一首七言古风，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潺潺流泉水芳冽，国难当头心欲折；
不是泉温是火焚，誓捐头颅洒热血。
铁血三千洒桃花，英雄半属女儿家；
平边弥乱秦良玉，持节直追汉军车。

同胞同胞奋臂起，长枪大戟东北指；
不是当年旧温柔，不复民族心不死。

高玉柱与喻杰才率领的边疆宣慰团所到之处，受到土司、头人与地方民众的热烈欢迎。滇南红河两岸哈尼族糯稿等16位土司曾与宣慰团会面，共商团结抗日、出兵出钱、维护边疆治安之策。随后，众土司联名致电中央，称感念高玉柱“冒瘴长征”、慰抚边民，表示愿率部捍卫边疆、拥护政府，并共同募集国币10万元捐献中央，申明“报国赤诚”。

然而高玉柱的生命却在宣慰途中戛然而止。1942年9月，年仅36岁的她因感染病菌，于金平县逝世。国民党中央社随后发布高玉柱病逝的消息，中共《新华日报》亦迅速转载。

高玉柱曾誓言为复兴中华民族不惜“割头颅、洒热血”，更以“铁血三千洒桃花，英雄半属女儿家”的豪情，以身殉职于滇南边陲。正如中山大学教授温春来所言：“高玉柱是民国时期声望最著的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在推动西南非汉人群的政治承认方面，她立下了不朽功勋。在民国少数民族史、妇女史方面，她值得我们浓墨重彩地加以书写。”

（作者单位：丽江师范学院）

下关沱茶：茶马古道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态见证

王国强

茶马古道作为历史上多民族互嵌共生的重要文化纽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深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茶马古道正是这一重要论述的生动历史见证。作为古道上的“活态遗产”，下关沱茶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内涵。本文通过剖析下关沱茶的制作技艺、流通网络与文化符号，揭示其中蕴含的多民族协作逻辑，探寻其从经济往来载体向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精神象征嬗变的内在路径。下关沱茶的百年演进，不仅记录了各民族在技术、经济与社会层面的交融历程，更映射出中华民族从文化认同到命运与共的伟大实践，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启示。

下关沱茶蕴含的历史基因

下关沱茶的创制、流通与使用，在物质、社会、象征三个空间维度，镌刻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基因。

物质空间：生态智慧与技术交融的结晶。1902年，大理白族商号“永昌祥”融合汉族团茶工艺与藏族运输需求，创制出外圆内凹的沱茶形制，有效解决了茶马古道运输中的防潮抗压问题，并适应了藏区高热量饮食对后发酵茶的特殊需求。其核心的“三层拼配工艺”更构建起跨民族资源协作体系：古树茶优势互补，形成“一茶跨三域”的生产共同体。白族工匠还巧妙利用下关峡谷强风实现天然风干，将自然气候转化为工艺特色，展现出“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技术、环境与文化的有机融合，更成为各民族共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社会空间：贸易网络与制度创新的信任建构。茶马古道不仅是商路，更是多民族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域。下关沱茶的流通依托滇藏、川藏双线，催生了制度化的跨民族协作与信任机制：白族“马锅头”统筹协调，藏族驮夫承担运输，纳西族沟通联络，彝族保障安全，形成分工明确的“流动共同体”。藏族商队凭刻有族徽的“赎茶板”赊货，回族商贾以符号记录的“羊皮账本”履约，构建了早期跨族际信用体系的雏形。这种通过经济规则创新促进族际信任的实践，为今天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象征空间：仪式共享与文化符号的意义熔铸。在跨文化互动中，下关沱茶升华为超越族别的精神纽带。剑川白藏通婚的“茶礼互嵌”婚俗，融合白族“三道茶”与藏族酥油茶礼仪，构建起族际婚姻的文化认同范式。云南驿古驿站的白族建筑融入藏族碉楼纹饰，沱茶图案成为共同装饰母体，实现了建筑空间的文化交融。当代博物馆成为象征空间创新的重要载体：剑川茶马古道馆以“茶”字多民族语言展示墙开篇，隐喻语言接触中的文化互渗。

启示与价值

下关沱茶的共同体建构功能随历史不断深化，其经验对当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历史经验：多元一体的内生机制。清代滇西马帮的“脚力股”制度，使藏族驮夫从劳动者转变为利益共同体成员，体现了经济互依机制；白族“三道茶”被赋予藏地叙事，经纳西族民歌传唱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符号，展现了文化互融机制；明代《茶马五利约》融合官方文书与民间盟誓，彰显了制度整合机制。这三重机制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茶马古道上的生动实践模型。

当代创新：活态遗产的转化之路。在新时代，下关沱茶通过创新实践实现价值转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注入新活力。一是空间活化与文旅赋能。下关沱茶博物馆与剑川茶马古道馆形成“双核叙事”，利用VR重现历史场景、体验非遗传承技艺，将资源转化为党性教育和国情教育的生动教材。铜钱镇“古道诚信积分墙”将游客参与与民族罐罐茶、白族沱茶制作转化为经济激励，沙溪古镇融合沱茶品鉴与民族歌舞展演，以“文化接触—经济收益—认同强化”的逻辑层次打造独特的文化体验。二是深化两岸文化纽带。“销法沱”（云南普洱茶）经港台转口形成的共同味觉记忆意义深远。台湾青年品尝“松鹤沱茶”后感叹“回甘如阿里山乌龙”的“茶汤认亲”现象，生动体现了沱茶在促进两岸心灵契合中的独特作用。三是学术话语构

建。解析沱茶从“实用商品”到“非遗符号”的意义嬗变，揭示其作为“社会生命载体”的文化赋值过程。同时保持学术批判性，正视历史上“以茶治边”的复杂性，为构建科学、全面的共同体叙事提供支撑。四是融入国民教育。推动沱茶非遗进入中小学课程，开发“跟着沱茶走古道”研学路线，构建覆盖干部、群众、青少年的立体教育网络，使多民族互嵌共生历史内涵更加深入人心，增强大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下关沱茶的百年历程，是一部多民族从技术互嵌走向命运与共的壮阔史诗。如今，古道驼铃声已远去，作为“活态遗产”的下关沱茶，依然在物质、社会与象征的维度上，持续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贡献力量，深化对下关沱茶等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与创新转化，有利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滇西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普洱市澜沧县糯扎渡镇雅口村茶马古驿站大歌场。
本报记者 王毅 摄